

“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研究： 从西方经验到中国语境

——以农民工为重点的文献考察

乔同舟^{1,2}

(1. 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2.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研究渐成热点,但研究论域和框架仍有待廓清。借助文献分析方法,梳理了“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研究在西方可资借鉴的若干理论资源或研究路径,以及在当下中国面临的特殊社会语境。结果显示:与西方聚焦的跨国移民性质不同,中国的移民,主要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乡村—城市”单向性国内移民。由于西方经验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差异与间离,研究我国“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的关系”,既要借鉴西方经验,更要立足中国语境。另外,“移民与媒体”议题应该置于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的互动关系中考察,因为结构与政策的错位和冲突,是中国国内移民身份认同困境产生的主要根源。

关键词 身份认同; 移民; 媒体; 中国语境; 农民工

中图分类号:G 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4)04-0083-09

近年来,“增城外来工事件”等社会冲突的频发,在不断警示:作为城市新移民的主要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困境和身份认同危机,已是影响中国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入”问题,渐成社会研究关注的焦点,大众传播与新媒体的影响因素也被不断强调,但基于传播学的相关研究仍显散乱而薄弱。文献检索显示,传播学视角的农民工研究主要有 2 个方面:一是农民工的媒体呈现研究;二是农民工的媒体使用研究。关于媒体呈现的研究,多聚焦于大众媒体对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的社会呈现和形象塑造及其社会影响^[1-3],只有少量研究论及了大众媒体对农民工的身份建构作用。关于媒体使用的研究,则主要关注农民工在媒体使用习惯、类型和目的上的特征、差异及其影响。相关研究发现,媒体使用对农民工的人际交往、信息获知和归宿感的形成等均有积极作用^[4-5],而新媒体的使用则对农民工自我意识、社会适应、价值观念、社会关系等有重要影响,强调了新媒体的赋权作用和身份意义^[6-9]。此外,也有一些研究重点分析了传播技术普及、媒体使用和媒体呈现在农民工个人现代性形成、城市适应、城市社会

融合中的作用与意义^[10-12]。以上传播学视角的研究,虽大都涉及了“身份认同”问题,但并未把它作为核心概念和关键变量进行考察。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研究,社会学视角居多,聚焦于“乡村—城市”移民在“市民—农民”这一归属性身份及影响身份认同的因素研究^[13-14]。但传播和媒体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尚未被纳入考虑。

总体而言,国内对“媒体与农民工身份认同”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较多面向的涉及,但不够深入,而身份认同中的媒体因素,仍有待挖掘,研究的框架,也有待廓清。基于此,“媒体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关系”的研究,既有必要返回其母议题:“媒体与移民的关系”研究,更有必要返回其研究历史和当下现实。媒体在移民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入中的角色与功能一直是西方传播研究的经典议题,自“芝加哥学派”始,至今已积累了大量成熟的理论资源。但中国的国内移民和西方的移民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经验能否直接移植于中国语境?在中国语境中,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的关系究竟为何?进而言之,如何把成熟的西方经验和具体的中国语境结合起来考察?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文献梳理的方法,归纳西方有

收稿日期:2013-09-29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体使用与身份认同研究”(2011RW016)。

作者简介:乔同舟(1980-),男,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媒介与社会、广告传播。E-mail:joe_camel@163.com

关“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的关系”议题的研究路径、方法和理论,考察“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的关系”研究在当下中国面临的特殊社会语境,借以从路径、语境和维度三方面廓清这一研究的基本框架。

一、身份认同、移民与媒体

20 世纪以来,全球化潮流的历史后果之一,就是人类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迁移和流动,以及紧随的文化碰撞、融合和文化多样性的减少,移民的身份变得越来越复杂。与此相应,则是民族主义思潮及其变体的对抗性生长。这两股矛盾的潮流相互激荡的结果之一,就是现代人尤其是移民的身份认同困境。如卡斯特尔所言,“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和群体认同这两种对立的趋势所塑造”^[15]。

“身份认同”是一个仍具争议的概念,它大致和英文的两个单词对应,identity 和 identification。文化研究学者认为,identity 一词兼具“身份”和“认同”两种含义:当表示某个群体或个人据以确认自己在一个社会之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时,可以用“身份”一词来表示。当某个人或群体试图追寻、确证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时,identity 也被称为“认同”^[16]。相应地,在文化研究中,人们关注的重点往往是不同人群在社会之中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简单地说,我们要在理论上追问自己在社会和文化上是“谁”(确认“身份”),以及如何和为什么要追问“谁”(寻求“认同”)。也许考虑到 identity 的名词和静态特征,一些社会学者主张用动词式和开放式的“认同”(identification)一词来代替“身份”(identity)^[17],因为任何“identity”都需要以“identification”的形式来促使人们产生行动。如果说文化研究更强调文化身份认同,那么社会学研究则更看重社会(身份)认同。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fication)指个体对其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的主观确认^[18]。此种认识受到了 Tafel 等的社会认同理论的影响,基本上把身份认同等同于社会认同。Tafel 把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她)的情感 and 价值意义^[19]。其具体所指也就是社会身份认同。可见,提到身份认同,一般包括两大方面,社会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

每个人都有多重身份,社会学家亨廷顿将人们的身份分成了 6 类^[20]:① 归属性身份,如年龄、性别、人种等;② 文化性身份,如民族、语言、宗教和文明等;③ 疆域性身份,如所在区域、国别等;④ 政治性身份,如集团、党派、意识形态等;⑤ 经济性身份,如职务、职业、单位、产业、阶级等;⑥ 社会性身份,如俱乐部、同事、休闲团体等。需要说明的是,亨廷顿的分类主要侧重于社会身份,但显然,他对身份的归类实际上已经把文化身份包含在其中了。以上分类,前两种主要属于先赋性身份,更多地和文化身份相联系,后四种则主要属于后致性身份,与社会身份有关。身份类型的先天赋予和后天获致特征的差别,影响了社会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的差异。

身份认同问题在移民身上表现最为明显。身份认同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identity)相关理论认为,“因为我是谁,所以我行动”(I act because of who I am),人们根据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来做出相应的行为^[21]。而困扰移民最大的恰恰是“我是谁”和被视作“谁”的问题。因为移民的跨地域流动,不仅涉及了旧环境的脱离与新环境的嵌入,更关联着旧社会网络的隔断与新社会网络的组建,以及在迁入地的冲突和适应,它既反映了身份的变迁,更凸显着认同的矛盾。以中国为例,数量庞大、成分复杂的城市移民群体,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但仍是城市社会的边缘群体。在其自身看来,他们是“看不到终点、回不到原点”的“过河卒”,虽努力打拼仍难以和城市人享受同等待遇;在城市土著眼里,他们是分享资源、加剧竞争的“外来者”,常常把他们视为城市社会治安和秩序的“破坏者”。而“他者”和“异类”认知往往是引发移民和土著发生冲突的根源。可见,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不仅涉及自身,而且已经和社会流动、群体冲突、阶层分化、社会整合、社会结构重建等重大问题密切相关。从类型来看,移民既有国际、国内之区域之分,也有劳力移民、知识移民和投资移民的性质区别,还有灾害移民、生态移民、扶贫移民和工程移民的目的差异。但不论哪类移民,如何实现社会融入和社会适应都是面对的首要课题。而“身份认同”作为公民身份的心理层面,对于移民群体融入当地社会至关重要^[22]。

当今社会已经成为“媒体化社会”,人们生活在大众媒体、人际媒体等信息传播媒体构建的拟态环境中,人们依靠媒体来感知现实并作出反应,甚至

依靠媒体和外界进行交往沟通。作为信息的采集者和把关人,设置议题框架、再现社会关系、影响受众认知的传播系统,媒体在现代社会中作用非凡。某种意义上,阶层、群体和民族一样,都如安德森(Anderson)所说,是媒体制造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23]。媒体具有再生产功能,它能催生、引发、强化、固化一个群体的身份意识,从而“制造”某个阶层或群体^[24]。媒体也具有整合与协调功能,它通过创造共享的生活方式、经验、事件、时尚和日常生活习惯,把不同的对象群体连接在一起。可见,心理层面的身份的形成,身份认同的构建,与媒体有很大的关系。

现代社会又是典型的“陌生人社会”。频繁的社会流动加剧了社会交往的异质化,时间的加速和空间的压缩则扩大了社会交往和社会认知的范围。居住者尤其是移民,对一个区域及其文化的认识、理解和融入,以及对他的认知,除了有限的亲身体验和人际传播之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媒体传播。而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代表的新一代移民群体,大多是80后出生,属于媒体伴随成长的一代,相较于上一代人,他们更易于接受来自媒体尤其是互联网的知识 and 观点,而非单纯的人际网络,这使得他们对媒体的依赖更加严重。大众媒体具有都市化和本地化倾向,互联网则有去地域化色彩和虚拟性特征。大众媒体赋予的文化标签、互联网产生的虚拟身份,与新移民群体现实中的身份,有着怎样的交织和纠缠?这对其身份认同有何影响?媒体多元化带来的身份认同焦虑和复杂化问题日益凸显。

因此,从传播角度考察媒体在移民身份认同中的作用,常常成为中外学者研究移民问题的切入点。

二、“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研究的西方经验

由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流动首先是跨文化跨国界的人群流动,文化身份认同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因此,国际上对于移民身份认同的研究,也集中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性移民文化身份和社会身份的探讨,尤以前者为主。

全球化背景下的移民,主要体现为跨国移民,既包括自愿性的投资性移民、技术移民、偷渡客等,也包括非自愿性的难民、工程移民,涉及了不同种族、

民族、地区等的多元文化群体。因此,移民文化适应的群际差异,即共时态的横向比较,成了西方移民身份认同研究的关注重点。以美国为例,Zhou 通过对亚裔社区不同族裔移民的比较研究,发现聚居区族裔经济和社区结构,是形成族裔资源、积累社会资本,进而促进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的关键,但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经济背景会导致不同的同化和社会流动轨迹;而移民和全球化过程的跨国联结,则又导致了美国的亚裔人口和社区多元化,并创造了新的社会适应和社会流动性模式^[25]。

西方学者在研究跨国移民身份认同时,也十分重视历时态的比较,即关注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在身份认同上的差异。有研究发现,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之间的生活经历、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吸收以及同化的速度差异很大,这些差异也是导致两代之间关系紧张以及不同集体行动方向和策略的主要原因^[26]。一般来说,第一代移民比第二代移民更能接受迁入地的社会不公和身份歧视,而第二代移民则对身份更敏感,也更容易有身份认同的危机。原因在于,第一代移民的参照对象是迁出地境况,而第二代移民的参照对象则是迁入地居民的生活——他们更容易有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对权利和生活的期望值更高,对于不平等更缺乏忍受性,也更容易采用较激烈的对抗行为^[27]。

国际移民的迁移形式也是西方移民研究关注的焦点。查尔斯·蒂利在研究欧洲与北美的迁徙史时发现,除了一般性的职业移民——即通过在城市谋取正式工作而定居的移民方式,乡村往城市或不发达国家往发达国家的移民还有两种形式,循环移民(circular migration)和链式移民(chain migration)^[28]。循环移民指如农业工人等经常季节性或者更长时间的周期性流动,从一个根据地到另一个根据地寻找临时工作。链式移民则是指一些率先实现在迁徙地定居的移民,不断为后来的家人、亲朋、同乡提供援助、信息和鼓励,并依托一定的人际网络和社会机制,帮助后来者实现迁移,从而促成一组组相关的个人或家庭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循环移民是链式移民的最初形态,链式移民则已经成为移民的主要形式;成员网络和资源隔绝形成的机会累积,在链式移民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道格·桑德斯认为蒂利的研究发现了世界人口大迁徙背后的中心机制:“从原本的循环移民转为定居人

口,从而协助其他人的迁徙活动,他们因此而能够在城市里建立一个更为稳固的村民基地,打造一套非正式的制度,使得更多村民能够持续流入城市,也使得移民转型得以发生”^[29]。他把链式移民由乡村向城市过渡的这种具有独特的非正式制度的据点,概括为“落脚城市”(Arrival city)。落脚城市不仅是移民临时的立足点,也是乡村网络和城市环境发生交汇的地方,是移民练习并适应城市文化生活的见习场所。落脚城市的发现,对于研究移民的身份认同无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和样本。

卡斯特认为,“所有的认同都是建构起来的”,与象征性内容、集体记忆、个人幻觉、制度、权力机器等有关^{[15]6}。而作为意义生产的工具,媒体和传播无疑应该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某种意义上,媒体是构成现代群体身份认同的主要社会文化机制。在前现代社会,时空限制了人类体验,自我意识和类属意识初步形成;在现代社会,时钟时间支配空间和社会,人类的主体意识觉醒,基于血缘关系和宗教的认同弱化,国家和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逐渐强化;在时空被压缩的后现代社会,大众媒体成为重要的替代性的文化身份认同的来源,推动着当代人的文化身份认同的解构与建构^[30]。但全球化和数字化潮流的出现与普及,又在继续改写着人们的身份认同难题。齐格蒙特·鲍曼指出,现今社会世界正由相对稳定的“固态”向流动的“液态”转变,全球化和消费主义推动了社会的开放,加速了资本、商品、劳动力在全球范围的流动,也导致了社会连带(social solidarity)的消解,传统的关系网络和保护机制解体,新的又尚未形成,个体日益陷入流动和不确定性的恐惧之中^[31],身份认同对于个体的社会适应显得越来越重要,但身份认同也变得越来越难。

按卡斯特的观点,当今媒体和电子通讯的全球化与地方化,就是信息的去民族化与去国家化^{[15]309}。它在消解着国家认同的同时,也在强化着群体认同。尤其是互联网,产生了虚拟身份,影响着个人身份认同,虚拟社群的出现也引发了新的想象性文化共同体^[30]。那么,新媒体的出现以及媒体技术的发展,究竟是认同的危机还是认同的力量?媒体,究竟在移民身份认同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

有西方文化研究学者认为,全球流动构成了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制度和实践,包括移民民族图景、意识形态图景、经济图景和技术图景等^[32],而这些有

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在相关媒体图景中的再现和陈述被转化成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想象”的过程,就是形成本土和跨本土身份认同和连带关系的过程依赖,以及移民文化消费者创造性的参与、文化协商和文化转化的过程,还有他们在使用主流媒体和移民媒体的认知和情感投资的过程。受众在媒体图景中,通过加入、复制和文化变迁的过程来参与移民文化的形成,最终完成移民文化身份的建构。

媒体如何在移民文化身份认同建构中发挥作用呢?作为传播学经验学派的代表,被称为“大众传播的第一个理论家”的罗伯特·E·帕克,通过深入少数民族社区,在对数十种移民报刊进行调查研究后做了更为可靠的回答。帕克发现,移民报刊主要作用在于帮助新近加入的移民懂得如何在北美生存下来,很少有报刊鼓励对于原先祖国的忠诚^[33]。帕克强调它们的角色有助于维护种族文化,并使移民透过家乡的语言来触摸大都会生活,从而更顺利地融入美国,促进美国社会大熔炉的建设^[33]。此后有不少研究集中探讨了外国移民的媒体使用及对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的影响,证实移民媒体(如种族语言媒体)、当地媒体和人际网络对促进移民的归属感至关重要^[34]。在全球化的传播大环境下,移民传媒构筑起独特的文化空间。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源于不同族群和文化传统的受众具有不同心理需求,移民传媒有助于其受众进行民族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

跨国移民浪潮的背景,是西方掀起的现代化转型过程。因此,移民在新环境的适应过程,也被诸多研究者看成是再社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英格尔斯等关于大众媒体在人的现代化中的作用的研究,是发展传播学领域的经典范例,他采用的量化分析方法和现代化理论视角,以及相关结论——人的现代性形成与大众传媒的使用密切相关^[35],对后续研究影响极大,可以看做是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研究的另一种路径。

从“拟态环境”“议程设置”“涵化理论”到“使用与满足”理论,媒体接触与使用对人的影响,一直都是传播学诞生以来关注的核心议题,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风起云涌更是备受关注。桑德拉·鲍尔-洛基奇和梅尔文·德福勒提出的媒体系统依赖论(media system dependency theory),对生活在媒体化社会中的人们的行动做了很好的诠释。媒体依赖

理论认为,个人像社会一样与媒体系统产生依赖关系^[36]。个人受谋求生存与发展这两种基本动机的驱使,树立起3种目标:理解自身与社会,确定行动与互动方向,并获得社交或单独娱乐。这些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个人接触媒体控制的信息资源,而信息化社会的大量非确定性使人们对这些目标的实现更加渴望,就更依赖于媒体的传播。当然,个人也不是完全被动的,为了实现目标,每个人都会选择并构成自己的媒体组合。不同的个人媒体系统,其媒体依赖关系也是不一样的。环境是影响媒体依赖程度的重要因素,当环境起变化时,人们为自己构造的媒体系统也随之起变化。在后期,该理论被进一步发展成传播基础结构论(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theory),认为在不同地区独特的传播基础结构,会对人们的社区归属感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个人与不同媒体或传播网络的联结性则会影响到其自身的归属感和身份意识^[37]。无疑,媒体系统依赖论与传播基础结构论的提出,给媒体何以能够对移民身份认同产生影响做了注脚。

三、“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研究的中国语境

中国与世界同处全球化浪潮之中,同样发生着频繁的各种人群流动和迁移。西方关于移民身份认同的研究,对正处于现代化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中国而言,无疑是宝贵经验,为探索中国移民身份认同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但研究我国的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的关系,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资源和研究经验,必须回到当下中国的语境(context)。中国与西方国家最大的不同是,在世界格局内,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仍是移民的主要输出国。中国每年流向欧美的知识型移民、劳力型移民和投资性移民逐渐看涨,与此同时,海外向中国移民的人数虽在改革开放以后有所增加,但总量依然很少。因此,中国的移民问题,主要是国内移民,而且,主要体现为“乡村—城市”移民的单向流动,移民的主力群体,也主要是以劳力移民为主的农民工群体。这决定了中国社会移民的特殊背景:户籍制度和社会转型。社会转型使得流动和迁徙成为必然,而户籍制度则滋生了地域差别、城乡差别、阶层差别和身份歧视等问题。这一矛盾使得“乡

村—城市”移民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格外凸显。

从社会结构上来说,中国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阶段,大力推动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以及作为世界工厂的制造业格局,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对人口流动有着内在的渴求。从社会政策上来看,出于社会稳定和管理方便的需要,加上历史沉疴的积弊,中国目前仍实行壁垒森严的“城乡二元分割”户籍制度,乡村户籍的人员来到城市工作,只能暂住在城里,在医疗、教育、生活等诸多领域受到限制,无法享受城市带来的福利。最关键的是因此引发的身份歧视,“农民工”这一奇怪的称谓就是例证。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农民工成为候鸟,每年的春运,就是这些在城市里无家的候鸟不得不选择的迁徙潮。以桑德斯研究的落脚城市为例,国外落脚城市的土地基本都是国有的荒地和废地,最后的结果是将土地授予移民占有者,使之合法化。落脚城市在中国往往被称作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城中村,移民都是外来的租客,不但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反而遭受的盘剥和压制更多,要付出的代价更大;另外,城中村内部的“内卷化”交往,也增加了农村移民与城市社区之间的疏离感^[38]。物质上的代价和心理上的游离,让移民们对城市和乡村的感情也更加复杂,身份认同也变得更加不稳定。

不仅中国社会移民具有特殊性,中国的媒体也具有特殊性,既具有双重属性的制约,更存在社会结构和政策的矛盾。一方面,中国的媒体都受“党管媒体”原则的制约,必须接受党的领导,无可避免地具有宣传工具的性质,肩负意识形态功能^[39];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媒体在市场化浪潮的影响下,逐渐走向产业化和企业化,尤其是在传媒集团化和市场化改革中,很多媒体具有了现代企业的雏形,开始受市场原则的制约。换言之,在社会结构层面,媒体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商业化的媒体,并具有强烈的城市化倾向,市场和资本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在制度或者政策层面,媒体并没有摆脱权力的束缚,依然充当着舆论引导和政策宣导的工具角色。另外,不论在社会结构上还是社会政策上,中国尚没有发展出一个成熟可靠的公共媒体。权力和商业的双重钳制,使得媒体在对弱势群体的呈现上,出现了偏差和成见。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分割,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屏蔽”,它有效地把农民“屏蔽”在城市的所有

资源之外,媒体即是重要一种。媒体本身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和盈利组织的特性,决定了它没有把农民和农民工作为其主要受众群体,当然也缺少相应的关注。今天的大众媒体,本质上是城市化的,农民、农民工和媒体的关系,多少有些隔阂^[40]。因此,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并非着眼于其自身,而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其市民受众和管理者的需要。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转型,中国的媒体也不断处于裂变和分化过程中。大众媒体内部,一部分媒体正在转变为专业主义媒体,肩负了更多的公共职能;同时,新媒体如互联网和手机的雄起,正在改写大众媒体一统天下的格局。互联网上的论坛、群、聊天工具、微博等新媒体手段,不仅丰富了媒体的样式,更打破了大众传媒的话语垄断,其去中心化和分权特性,对传播资源贫乏和话语权不足的弱势群体起到了一种赋权作用。

人口流动的现实与户籍限制的政策之间的矛盾,大众传媒双重属性之间的内在张力与角色冲突,大众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竞争格局,构成了研究作为城市移民主力的农民工群体媒体使用与其身份认同的现实语境。

但值得注意的是,构成这语境的,也包括了渐趋复杂化的农民工群体自身。在今天,农民工群体本身的职业类型、劳动关系和社会归属也变得日益复杂,随着在城市化背景下成长的第二代农民工的出现,随着农民工从事的具体行业、工种以及劳动关系的多元化,以往对农民工的既有认识,以及研究视角和方法都面临亟待调整。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在城乡二元体制下由出生的家庭规定了身份、地位、经济状况等特征的“先赋性角色”。但大多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并没有务农经历,反而对城市生活有着更多的向往,其“自致性角色”,则是跨越城乡二元结构,消除自身差别,做一个城市人。与上一代农民工比起来,他们因为“先赋性角色”带来的身份地位限制,不可避免地携带了城乡隔阂;但另一方面,他们和父辈又有着明显的代际差异,在生活方式、消费追求等方面更接近于城里的同辈,都是媒体环境下成长的一代,更有意愿也更善于使用媒体。以往的研究中,曾经利用社会分层的理论,把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归为缺乏也不善于使用传播资源的阶层,即“那些缺乏参与传播活动的机会和手段,缺乏接近媒体的条件和能力,主要是被动

地、无条件地接受来自大众传播媒体的信息的人群和那些几乎无法得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各种信息、也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的群体”^[41]。毫无疑问,这一观点用在上一代农民工身上是合适的,但套用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则显尴尬。因为,语境和主体均已发生了变化。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和上一代一样劳动繁重、收入低微,但并不缺少现代传播观念,更不缺乏使用媒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新媒体的出现,也大大降低了接近并使用媒体的门槛。

作为劳工阶层的一员,农民工和其他工人一样,分布在各行各业中,如建筑业、服务业、制造业等领域,而且往往是各行业中的缺少稳定劳动关系和合同保障的非正式工。“农民工”一词,是建筑工人、制造工人、服务员、保安、保姆等工种的综合抽象,它在突出了诸多农民工中“农民”这一共同政治身份的同时,却忽略了不同行业农工具体的实际的职业身份及其背后的意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沈原提出,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要从“抽象工人”转换到“具体工人”上来^[42]。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大量数据分析 and 量化描述式的一般化研究,虽然为农民工流动提供了总体性画面,也总结出了诸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等一般法则,但把农民工变成了一个抽象而庞大的社会范畴,忽略了农民工作为具体的、历史的、有差别的正在生成中的群体成员。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引入“民族志”研究,引进曾经被“科学规则”无情精化掉的各种有意义的细节,关注各种工人的具体形象、具体的生活和工作场景,以及描述他们在具体的情境之下的时间逻辑^[42]。同样,对媒体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关系的研究,也必须回归到具体的“农民工”形象和具体的媒体使用场景。

综合以上,探究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危机,以及媒体使用对其身份认同的影响,都必须回到中国当下、借诸彼此交织的四重语境中来观照。

四、路径、语境与维度:研究中国媒体与移民问题的基点

通过文献梳理,本研究认为,“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研究中,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存在着巨大差异,进而总结出了西方相关研究可资借鉴的研究路径,以及媒体与移民研究在中国面临的特殊语境。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移民与媒体问题,发端

于“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之间的错位，问题的最终解决，研究的主要焦点，也必须围绕这两个维度展开。基于以上3点，笔者尝试通过分析，构建中国“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研究的基本框架。

1. 基于西方经验的六大参照路径

第一，亨廷顿有关身份的分类，强调人的身份的社会性，又同时兼顾了文化和心理在身份建构中的作用，更有利于揭示当下的中国移民身份特征，指标方法均可借鉴。第二，美国有关移民群体的比较研究（包括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的纵向比较，以及不同族裔移民间的横向比较），对于研究国内移民群体的身份认同差异，以及参照环境在其中的影响因素，同样极具借鉴意义。随着农民工群体的日益壮大，其组成也越来越多元化，对抽象的农民工的研究必须转向具体的农民工研究，因此，有必要考察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间的代际差异，农民工群体与其他移民之间的群际差异，以及农民工内部不同职业群体间的群际差异。第三，桑德斯的“落脚城市”研究，揭示了中国特色的城中村（如河南村、浙江村）、城乡结合部对于考察农民工城市适应和身份认同的样本意义。要研究中国特色的链式移民（依靠传帮带，一人带出一村），研究中国“乡-城”移民和城市土著的冲突与融合，研究中国“乡-城”移民在城市的再社会化过程，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显然都是一个典型样本。第四，英格尔斯关于媒体与人的现代化的研究这一传统对于我们考察移民尤其是劳力型移民的城市身份认同很有启发。因为乡-城移民（主要是农民工）由农村到城市的适应过程，也就是其现代化和再社会化的过程，媒体在农民工身份认同和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英格尔斯的考察指标值得参考。第五，帕克及后来者的移民媒体及其作用研究，可部分解释中国移民因缺少缓冲而难以适应城市的原因，作为一个反向参照，可考察阶层媒体在当代中国缺失情况下的移民身份认同危机。第六，桑德拉·鲍尔-洛基奇的媒体系统依赖论与传播基础结构论，阐释清楚了媒体、社区以及归属感的关系，指出了个人与不同媒体或传播网络的联结性对个人的社区融入和身份建构的影响，可作为研究视角，观照中国农民工在城市的媒体依赖、传播网络及其影响。

2. 基于中国现实特殊性的四重语境

第一重语境，是中国国内移民的特殊性，表现在

人口流动与户籍限制的对立，导致了国内移民尤其是农民工工作和家庭的分离，职业身份和社会身份的分离。这种分离，构成了农民工身份认同危机的重要背景。第二重语境，是中国媒体性质的特殊性，即宣传工具、文化企业与社会公器的多重角色的内在冲突。在这三重角色中，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表现明显，而公共性则似有若无，隐而不彰，这构成了中国媒体的政治经济处境。媒体内嵌于社会结构之中，掌握着重要的传播资源，这对弱势群体的形塑有何影响，值得追问。第三重语境，则是数字化时代的中国传媒生态特殊性——中心化的大众媒体与去中心化的新媒体之间既竞争又联合的格局。由于大众传媒在中国的意识形态角色，在中国传媒格局中依然处于核心地位，并在体制中有着严格的等级序列，新媒体的出现挑战了大众媒体的话语权，也引发了媒体内部的分化和重组。新媒体能否成为替代性媒体为弱势群体提供传播资源？或者新媒体的冲击能否刺激部分大众媒体在分化中彰显其公共角色？同样需要聚焦。第四重语境，是移民群体自身的特殊性。中国国内移民的主力是农民工，而农民工自身的特殊性在于：先赋性角色与自致性角色的矛盾；抽象农民工背后的多元角色分化的矛盾。身份体制对后天努力的束缚，代际分化与群际差异的渐显，都构成了农民工群体的复杂现状。

以上四重语境，都体现为不同程度的内在矛盾，恰恰说明了转型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的冲突和错位导致的现实复杂性。

3. 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两个关键维度

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的形成都来自于社会合力的综合作用，一个相对客观和宏观，一个相对主观和中观，二者的相互影响，最终形成新的社会现实。社会结构是社会政策的出发点，而社会政策一旦出台，就会作用现实，并逐渐内化为社会结构。中国的“乡-城”移民，因为地处社会结构底层，往往缺少话语权，无力也没有机会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出台的政策往往很难站在他们的立场和利益，使得结构弱势变成了政策弱势，而政策的实施，又进一步强化了对移民的不利因素，政策弱势又进一步变成了结构弱势。媒体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源，媒体议程能够影响政策议程，从而最终影响社会政策的制定过程，也会影响相关群体的社会形象和自我认同。“乡-城”移民尤其是农民工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表，

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失衡和阶层分化,以及中国媒体的政治经济处境,造就并强化了弱势社会群体的双重弱势:结构弱势和传播弱势^[43]。考察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的关系,也必须把问题置于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的二维坐标体系中。

总而言之,在城市化进程加剧、进城农民工越来越多且趋势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只有立足于中国语境,借鉴西方经验,把握好社会政策和社会结构 2 个维度,才能深入理解媒体在农民工身份认同和城市融入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从而探讨如何利用媒体在移民身份建构中的作用,促成调试和化解农民工身份认同危机的传播社会学路径。

参 考 文 献

- [1] 李艳红. 一个“差异人群”的群体素描与社会身份建构:当代城市报纸对“农民工”新闻报道的叙事[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6(2): 2-14.
- [2] 乔同舟, 李红涛. 农民工社会处境的再现: 一个弱势群体的媒介投影[J]. 新闻大学, 2005(4): 32-37.
- [3] 许向东. 试论农民工报道中传播者的偏见与歧视现象[J]. 国际新闻界, 2008(2): 40-43.
- [4] 周葆华. 城市新移民的媒体使用与人际交往——以“新上海人”抽样调查为例[J]. 新闻记者, 2010(4): 53-57.
- [5] 王晓华, 蒋淑君. 媒体、家园、和谐社会——报纸接受对深圳移民城市归属认知的影响[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5(3): 57-65.
- [6] 杨善华, 朱伟志. 手机: 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动”选择——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手机消费的文化 and 心态解读[J]. 广东社会科学, 2006(2): 168-173.
- [7] 曹晋. 传播技术与社会性别: 以流移上海的家政钟点女工的手机使用分析为例[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9(1): 71-77.
- [8] 丁未, 田阡. 流动的家园: 新媒体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个案研究[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9(1): 61-70.
- [9] 王锡琴, 汪舒, 苑婧. 农民工的自我赋权与影响: 以北京朝阳区皮村为个案[J]. 现代传播, 2011(10): 21-26.
- [10] 郑欣.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基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J]. 南京社会科学, 2011(3): 71-77.
- [11] 陶建杰, 徐宏涛. 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与人际传播: 基于上海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新闻大学, 2012(1): 80-86.
- [12] 雷蔚真. 信息传播技术采纳在北京外来农民工城市融合过程中的作用探析[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0(2): 88-98.
- [13] 张文宏, 雷开春.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08(5): 117-140.
- [14] 彭远春. 论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服务员的调查分析[J]. 人口研究, 2007(2): 81-90.
- [15] 卡斯特尔. 认同的力量[M]. 第 2 版. 曹荣湘,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16] 汪民安. 文化研究关键词[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283.
- [17] RICHARD J. Rethinking ethnicity: Arguments and exploration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74-89.
- [18] 张文宏, 雷开春. 城市新移民社会认同的结构模型[J]. 社会学研究, 2009(4): 61-87.
- [19] TAFEL H, TURNER J C.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M]. Chicago: Nelson Hall, 1986.
- [20] [美]亨廷顿. 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 程克雄,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 25.
- [21] SOMER S, MARGERET R, GLORIA D. Reclaiming the epistemological“Other”: Narrative and the social constitution of identity [C]// CRAIG C.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London: Wiley-Blackwell, 1994: 37-99.
- [22] 陈映芳. 农民工: 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J]. 社会学研究, 2005(3): 119-132.
- [23] [英]安德森. 全球化与文化认同[C]//詹姆斯·库兰, 编. 杨击, 译. 大众传媒与社会,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 315-332.
- [24] [美]戴维·斯沃茨. 文化与权力: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M]. 陶东风,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171-190.
- [25] ZHOU M. Social capital formation in immigrant neighborhoods: Chinatown, Koreatown, and Pico Union in Los Angeles [M]. London: Blackwell, forthcoming, 2003.
- [26] ZHOU M, JAMES V. Contemporary Asian America[J].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7] 赵书凯. 边缘化的基础教育: 北京外来人口子弟学校的初步调查[J]. 管理世界, 2000(5): 70-78.
- [28] [美]查尔斯·蒂利. 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M]. 谢岳, 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 172.
- [29] [加]道格·桑德斯. 落脚城市: 最终的人口大迁移与世界未来[M]. 陈信宏,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42.
- [30] 石义彬, 熊慧, 彭彪. 文化身份认同演变的历史与现状分析[J]. 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 2007(年刊): 182-204.
- [31] [英]齐格蒙特·鲍曼. 流动的时代[M]. 谷蕾, 武媛媛,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3, 67-84.
- [32] [英]罗莎·萨嘉鲁西阿诺. 叙述海外移民: 移民受众与移民经验的建构[J].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08: 16-31.
- [33] [美]罗伯特·E·帕克. 移民报刊及其控制[M]. 陈静静, 展江,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 [34] 周葆华. 城市新移民的媒体使用与人际交往[J]. 新闻记者, 2010(4): 53-57.
- [35] [美]英格尔斯, 史密斯. 从传统人到现代人: 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J]. 顾昕,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315-332.
- [36] 张咏华. 一种独辟蹊径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 媒介系统依赖论评述[J]. 新闻大学, 1997(1): 27-31.
- [37] 张咏华. 传播基础结构、社区归属感与和谐社会构建: 论美国南加州大学大型研究项目“传媒转型”及其对我们的启示[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5(2): 11-16.

- [38] 黄建新.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制约因素与政策取向[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44-47.
- [39] 夏倩芳. 党管媒体与改善新闻管理体制:一种政策和官方话语分析[J]. 新闻与传播评论,2004(年刊):122-133.
- [40] 乔同舟. 乡村社会冲突中的利益表达与信息传播研究:兼论大众传媒的角色与作用[J]. 新闻传播评论,2010(年刊):91-100.
- [41] 段京肃. 社会发展中的阶层分化与媒介的控制权和使用权[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44-51.
- [42] 沈原. 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79.
- [43] 李红涛. 结构弱势与再现弱势:信息传播中的弱势社会群体研究[D]. 成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6:81-82.

Study of Media and Migrants' Identity Relation: from Western Experience to China's Context

——Based on Literature Research of Migrant Workers' Identity

QIAO Tong-zhou^{1,2}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2.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Abstract It has been heatedly discussed about the issue of media and migrants' identity, yet still there is a necessity to clarify the framework and sphere of the research. By the application of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theoretical resources or research approaches that were worth learning on research of media and migrants' identity relation, as well as the special social context in China today. The paper revealed that unlike western countries,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migrants consisted of migrant workers who followed the route of moving from the rural areas to cities. For the sake of great differences and alienation between west and east, studies on media and migrants' identity relation rely on western experience and additionally the social context of modern China. Further more, the issue should be inspected with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policy, the dislocation and conflicts of which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dilemma of identification for migrant workers.

Key words identity; migrants; media; Chinese context; migrant workers

(责任编辑:刘少雷)